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 明夷待訪录

导读

季学原 桂兴沅 著

巴蜀书社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 明夷待访录导读

季学原  
桂兴沅

巴蜀书社  
一九九二年成都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林 建

封面设计：陈世五

**《明夷待访录》导读** 季学原 桂兴沉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875 字数160千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90 册

ISBN7-80523-410-8/B·45 定价：4.45元

##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编委会

**主编** 蔡尚思

**编委** 陈子展 谭其骧 顾廷龙  
胡道静

##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用新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让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是广大中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

同志正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除窒息人心的文化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导言，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黄葵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赐教。

## 目 录

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代序言).....	( 1 )
导论.....	( 9 )
明夷待访录·题辞.....	( 70 )
原君.....	( 76 )
原臣.....	( 88 )
原法.....	( 95 )
置相.....	(100)
学校.....	(106)
取士.....	(118)
建都.....	(134)
方镇.....	(141)
田制.....	(146)
兵制.....	(163)
财计.....	(176)
胥吏.....	(190)
奄宦.....	(195)
研究资料索引.....	(206)
后记.....	(212)

# 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

(代序言)

蔡 尚 思

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了两个突出地位：一是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两部思想史；一是他的《明夷待访录》，为中国古代反君权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古来学者都肯定他在前者的地位，而少肯定他在后者的地位；就是都强调他是思想史家，而少强调他是思想家。我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在后者的地位比在前者的地位更加重要。现在就来专论和详述其在思想史上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中国思想史中最重大最关键的是君权问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最突出的；而最能围绕这个问题去反对它和想法去纠正它的，就是明清间的黄宗羲。我们必须从整个中国君权史来看黄宗羲的中心思想，才能认识他独能击中要害的崇高地位。

中国君权思想史大要如下：

主张对所有君主都必须尽忠尽礼而根本反对“弑父与君”、“犯上作乱”的尊君者，如孔子的尊周天王、鲁哀公、齐简公等。



主张层层选贤上同而不下比者，如墨子的“尚贤”、“尚同”。

主张无为而治的虚君主义者，如《老子》等。

主张为我主义的“无君”者，如杨子。

主张“君民并耕”、自食其力的无君者，如农家许行。

主张贤君反对暴君者，如孟子等。

在孔子忠君思想基础上，主张绝对君权者，如韩非、董仲舒、韩愈、朱熹等。

主张以天下为公而不要以天下为家，应当传贤而不要传子者，如《礼运》的作者和盖宽饶。

主张原始社会时代没有贵贱贫富之分的无君者，如庄子、阮籍、鲍敬言等。

主张“等贵贱，均贫富”者，如从陈胜到钟相等；但他们自己却颇同地主阶级一样有君权思想。

由于想不出办法而归结于“废有司，去县令”者，如邓牧等。他和魏晋时代的玄学家走向同一归宿。

吹捧秦始皇、明太祖者，如李卓吾等。

同在明清间，只要是逐君弑君的都绝对反对者，如王船山。

主张历代皇帝都应当由儒家代表来做者，如曾静。

稍后于黄宗羲，一面大反君权，一面主张天下治乱皆惟君，“身死而君变则死”者，如唐甄。

在清末歌颂秦始皇、明太祖者，如章太炎。

不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对任何君主都反对的民权主义者，如孙中山等。

主张君主立宪者，如维新派。

至于无政府主义派，君主当然在其反对之中。

到民国时代，还有许多遗老、复辟党、帝制派主张不可无君，那就不用多说了。

归纳一下，关于君权问题主要有宗法世袭、选贤让贤、虚君无君等几大派。

这些就是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君权问题展开争论的内容要点。

我对黄宗羲的代表著作《明夷待访录》一书，发现其最集中的观念就是反君权，实质上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檄文。它直到清末还为资产阶级民权派所大力宣传，绝不是无因无故的。说也奇怪，近现代学术界对明清间的三大家，最歌颂而多写文章的是王船山；讲到清代学术历史问题，最尊崇也多写文章的是顾炎武；至于论述黄宗羲的，可就远远不如顾、王二人，这未免太不公平了。现在试暂以此书和《留书》一稿为范围，把它大体概括如下：

一、黄氏指出，为公还是为私，是对于为君之职分明与不区分的区别。君的责任远远超过于天下人：他“不以一己之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在义务而不在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君主。后世的君主却正相反：“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样只知权利而不知义务，就成为“天下之大害”了（《原君》）。他又指出古今之君相反的原因在于：“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子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

为君也。”由于做了君主就有了一切，所以人们争来争去都是为了希望能够争到君权。君权的黑幕，被他揭开了！

二、黄氏敢于痛斥后世君主“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原君》）和小儒大官以“君父，天也”（《奄宦上》）的谬论。把君比作至高无上的天和血统关系的父，在封建时代都被认为是万世不易的至理名言。被尊为明清间“三大儒”之一的王船山，在黄氏心目中也只是“小儒”。另一个是顾炎武，他给黄氏书，以为自己著的《日知录》“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这也不是事实。只反非汉族的君主而不敢反汉族的君主，是顾、王二人所同，而远远不及黄宗羲。

三、元代邓牧《伯牙琴》痛斥君主“竭天下之财以自奉”；黄氏也同样反对后世“人主以天下为家，故以府库之有为己有”（《奄宦上》），“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原君》）。古人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最贵最富都是君主了。这是黄氏所痛恨的。

四、黄氏敢于反对后世“人主之多欲。……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他主张人主“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奄宦下》）。郑玄的注《周礼》说天子多妻制的规定，为数不太多，尚被黄氏驳斥；至于秦始皇、唐玄宗等后代君主的变本加厉、无比荒淫，更不必提及了。中国君主的多后妃、用宦官，确实是世界所无的。

五、黄氏同邓牧宣传“天子何常之有”，而斥“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奄宦下》）。封建王朝的君位都是世袭的。他这样说，就否定了所有

世袭的君主了。他还有传贤不传子的倾向，如说：“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宰相也”（《置相》）。这无疑废除世袭君权的一积极主张。

六、为民还是为君，是臣与不臣的标志。黄氏认为人臣的职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后世的人臣不明此义，是“宦官宫妾之心”，“私昵者之事”（《原臣》）。这样说，所有奴才般的人臣全被他痛斥了。

七、黄氏独有平等的眼光，敢于说出“臣之与君，名异而同”（《原臣》）。这是最反旧传统思想的一点。信如清末梁启超所说：“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宿于君权。……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八、黄氏有时以为臣是君的分身：“官者分身之君也。”君臣之间的高低等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国无长君”，不要“委之母后”（《置相》）。

九、黄氏且更进一步认为臣高于君而不在君之下：臣是“君之师友”，不是“君之仆妾”（《原臣》）。后世的人臣，其被视与自视都是“君之仆妾”，甚至连“君之仆妾”也不如。

十、黄氏敢于主张君相均不世袭，以相辅君，把君权分给宰相（《置相》）。黄氏关于君臣关系的十分大胆的一系列主张，是对唯心主义神学正宗理学所鼓吹的“君为臣纲”的封建忠君思

想的攻击，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批判专制主义的进步思潮，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十一、黄氏敢于痛斥“三代以下无法”，认为君主“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他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公然与古来儒家传统思想“有治人无治法”（《原法》）唱反调，同时，也和法家主张君主专制下的所谓“法治”相对立。

十二、黄氏有独特的胆识，公开主张“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也就是说，国家的政事，全要以学校的意见为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必须“公其非是于学校”。最高学府大学的祭酒（校长）应推选当世大儒担任，而其重与宰相相等，“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在全国人民之上的君主，也变成祭酒的学生了！他痛斥“学校之法废”、为“不仁之甚”，主张地方学官由大家公推，不能胜任就罢免。他并认为汉宋的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学校》）。

十三、黄氏敢于批评本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至废孟子而不立”（《原君》），是不指名的批评；“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置相》），是指名的批评，颇像司马迁写《史记》敢于批评本朝开山皇帝为“汉兴，高祖至抗暴也”。这比前乎他的李卓吾对明太祖的吹捧和后乎他的章太炎对秦始皇、明太祖的吹捧，高明多了。

十四、其他如主张“授田以养民”，减轻田赋，反对君主“以斯民为仇”（《田制一到三》）；主张废金银，使“天下安富”（《财计一》）等，也多是和反对君主专制有关的。

十五、他主张复封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反君权。

我读《明夷待访录》的《原法》时，只知道黄氏主张复封建；最近读到黄氏尚未出版的《留书》一稿，才了解其复封建的含义。《留书》阐明道：“盖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分兵民则不得不以民养兵，以民养兵则天下不得不困”（《封建》）。这才进一步地知其主张复封建在主观上也是反君主专制。他认为：秦以前的封建制，君权是相对的；秦以后的郡县制，君权是绝对的。这里要指出的是古人所说的封建，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十六、他在反对君主专制中，尤其反对非汉族君主对汉族人民的仇视。我读前书，只知“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原法》）；读了后一稿，才知其尤痛恨元的不以人类待汉族：“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留书·史》）假如说汉族君主对汉族人民是一重压迫，那么蒙古君主对汉族人民又多一重压迫了。章太炎在民族问题上尊顾炎武、王船山而抑黄宗羲，是不正确的。黄氏以反元来影射反清，其反清实不在顾、王之下，这有《留书·史》为证。但我对黄氏主张修改《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倒觉得他也有大汉族主义了。

十七、他反对正统史学乱分帝纪、世家的体裁。黄氏把“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归咎于“后之作史者”。以为与其如此，倒“不如无史之为愈也”（《留书·史》）。举例来说，如《晋书》；对同一四夷，“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传”是人臣的传记，“纪”是人君的传记。五代之君与十国之君无异，而作史者却有不同的对待：对五代之君“与于纂

弑者”，则尊为帝；对“守其疆土者”，则降为“世家”；对其生前尊为“帝”，对其死后尊为“帝纪”。“夫纪者犹言乎统尔”（同上），只要被尊为“帝”、为“帝纪”，就把割据的天下当作一统的天下，把各自称帝的君强分为君臣，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黄氏由于反对非汉族的入主中原，才说这种史学的体裁始于《晋书》；其实《三国志》已经开此恶例。陈寿的《三国志》帝魏而臣吴蜀，只有正统、法统，而毫无史德。

例子还有，就到此为止吧！

以上基本上是黄氏的优点。在封建君主的极权统治下，他独有一些主张，是很难能可贵的。当然，他也不免有缺陷，如主张复封建、反对小说、词曲；主张礼教风俗，一依《朱子家礼》行事；主张任子之法，咒骂农民革命，一再称李自成为“李贼”；主张三纲五常传自尧舜；主张“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等等。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黄氏的伟大。

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对于君主专制制度与君权，虽然也有触及的，但令人感觉不足的是：有的是两面性的，既反暴君，又斥反君是禽兽；有的只敢说太古无君胜于今世；有的只敢暗说，不敢明说；有的只敢少说，不敢多说。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黄宗羲独敢写出反君权的专书，却是有胆有识的、超过前人的，这是最值得后人纪念的一点。

所以我认为写一本《明夷待访录》导读，作为《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之一出版，供大家阅读、参考是很有必要的。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的季学原等同志做了这一工作，我很赞同。他们在黄宗羲故乡、浙东学派的发祥地，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应当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以此文为之代序。

## 导 论

### 一、中国民主启蒙主义先行者黄宗羲简介

黄宗羲，我国早期的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等，浙江余姚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1610年9月24日），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695年8月12日）。

黄宗羲是生逢其时的，时代几乎为他的成长创造了一切必要的客观条件；黄宗羲自己亦没有辜负自己的时代，他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驾驭时代风云，昂扬前进，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黄宗羲的时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又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历经两千多个岁月的封建主义的老朽躯体内，正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地震，整个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了，新世纪的晨曦已经依稀可辨。我们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正在自蹈死地、自掘坟墓。君主专制的极端化和腐朽化正同步驱向顶端，皇帝可以多年不召集大臣议政，朝政日趋昏聩荒废；奄臣则趁机篡权乱政，加强特务统治，残酷搜刮勒索财物，气焰熏天，无恶不作；大臣则上台下台，行若儿戏，生死全系于皇帝和太监的好恶喜怒之间。邪恶者，和奄



宦狼狽为奸；苟且的，投闲偷生，至万历末年，内阁仅剩一人，六部长官，正副职总共只留下四人。君主专制制度的末世光景已日益见出。

此情此景，促使地主阶级内部一些较为清醒正直的士大夫，先后形成东林党、复社等政治派别，反对专权的贵族、宦官，他们冷风热血，言议英发，力图洗涤朝纲，拨乱反正。但是，他们对朱明王朝的耿耿忠忱，几乎从来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且被视为灾星，惨遭翦除。人们有理由视之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

此情此景，又使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绝境。贵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继而又大片抛荒；广大农民无地可耕，衣食无着，而租税却日益繁苛，以至闹得民怨沸腾，农民和手工业者四起造反。南方半壁，工商市民还日益和知识分子相结合，互相支持，在苏州等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暴政运动。西北地区，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更以推翻朱明王朝为目标，其势锐不可挡。

在阶级矛盾白热化的时刻，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伺机而起，以其勃起的军事力量，实行民族征服。入主中原之后，继起明王朝的衣钵，在漫长的封建锁链的末端，又加上了一个新的环节。

这是一个方面。历史还有另一面：封建社会开始裂变了，资本主义的新芽顶破了千年冰封，破土而出。到黄宗羲长成智勇少年的时候，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已经在南方蓬勃发展起来。那些相继出现在苏皖浙赣的手工业中心，已经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那些作坊主、手工业匠、商人，已经以新的面貌登上社会舞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带动了空前的